

PROBABLE PEDIGREE
I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经济思想史的
可能谱系

钟祥财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选入了作者的经济思想史学术论文 21 篇,编为四辑。辑一是方法论阐述,讨论了经济思想史的内涵、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的关系、经济思想史体现的经济学逻辑、经济思想史的谱系等问题。辑二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传统贫富思想、法家经济思想特点、《管子·轻重》经济理论研究史、西汉经济思想流变、北宋经济政策思想争论等进行了探讨。辑三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研究,涉及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胡适、张东荪、顾准等,对统制经济思潮作了考察。辑四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论题包括经济思潮、重要命题、有争议的人物、理论演进、经济学说与时代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思想史的可能谱系/钟祥财著. —上海: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9

ISBN 978-7-313-25278-4

I. ①经… II. ①钟… III. ①经济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①F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63660 号

经济思想史的可能谱系

JINGJI SIXIANGSHI DE KENENG PUXI

著 者:钟祥财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印 制: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386千字

版 次:2021年9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25278-4

定 价:9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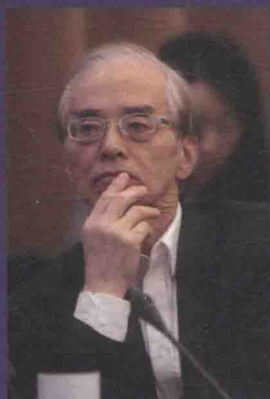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25.25

印 次: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7309



钟祥财，浙江鄞县（现为宁波市鄞州区）人，1954年8月8日生于上海。1971年参加工作，当过工人。文学学士（上海师范学院，1982年），经济学硕士（复旦大学，1986年），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2000年）。1986年进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8年被评为研究员，2001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巍巍交大 百年书香
www.jiaodapress.com.cn
bookinfo@sjtu.edu.cn



策划编辑 / 吴咏蓓
责任编辑 / 吴咏蓓
封面设计 / 右序设计

目 录

■ 辑 一 ■

经济思想的涵义及其史的写法·····	003
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逻辑 ——对计划体制的一个经济学解释·····	015
经济思想史的可能谱系·····	026
关于经济史学的几个问题·····	047

■ 辑 二 ■

中国古代贫富差别思想述评·····	069
从《商君书》看法家经济思想的方法论·····	087
《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研究述评·····	104
从学派到“独尊”：西汉时期儒家经济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化 ——以董仲舒为线索·····	133
北宋时期关于国家农业贷款利息问题的争论·····	145

■ 辑 三 ■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	157
----------------------	-----

严复：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忠实传播者 ——为《国富论》出版 240 周年而作·····	178
胡适为什么忏悔？ ——从其经济思想转变看中国现代理论现象·····	201
张东荪经济思想的近代意义·····	213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	230
顾准经济思想的方法论·····	258

■ 辑 四 ■

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和现代经济学的反思·····	281
关于“非意图的结果”·····	296
萨伊经济思想再议·····	309
经济思想史上对价值理性的工具性解释·····	327
计划经济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价值·····	345
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思想史考察·····	364
参考文献·····	384
附录·····	386
一、笔者已出版的主要著作·····	386
二、笔者已发表的部分论文·····	386
后记·····	396

辑 一

经济思想的涵义及其史的写法

把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视为可以分开来的两个学科的概念，这本身就是20世纪中国经济理论演进的产物，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对经济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变化过程。

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说法很有影响：经济思想是指在现代经济学产生之前人们就经济问题发表的见解。如有学者指出：在亚当·斯密以前，“经济学犹在‘实践知识的时代’，这时关于经济现象之研究，大家皆本于实践的应用的的目的，或只作了局部的片段的论述，及至斯密的《原富》出版，于是，关于经济生活之生产流通分配等现象，乃有条理整备的记述与体系一贯的说明。故可谓到了此时，经济学才达到了体系化的境地，而不复为从前之实践知识的堆积。不过，经济学虽被斯密加以体系化，然斯密动机之所在，则仍为一种实践目的即国富增进之企求，故其体系实不能谓为理论的体系，而只为一种实践的体系。”后来，李嘉图“又完成其更进一步的发展，李氏抱着纯粹科学的态度，采取极端抽象的方法，将经济学之各种基础问题，统一叙述于两个最单纯最普遍之社会的与个人的前提之下，而构成一个极严整极论理的理论体系，故可谓理论经济学之成立，实始于李氏大作《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一书之出版”^①。40年代初，王亚南在回顾经济学发展过程时写

^① 刘絜敷：《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页。

道：“最初，经济学是混在哲学领域中研究的”，“经济学绝非凭空建立起来，在经济学还没有体系化以前，我们称它为经济思想；这种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又称它为经济学前史。在经济学前史期，所有经济思想，只有到哲学中去寻找；它是片段地或琐碎地包含在各种哲学思想中。就是在经济学成立以后，许多哲学家，也同时多是经济思想家。”^①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划分不仅是指经济思想在时间上是经济学的前身，而且还意味着经济思想在内容上比经济学初始和简单。曾写下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唐庆增坦言：“中国在今日仅有经济思想(economic thought)而无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内容固属简单，与政治及伦理思想，混淆不分，且乏显明之经济派别，不足与言科学也。但思想发源，确较西洋学说为早，特以进步太缓，今日乃处于落伍之地位，社会人士对之，亦不甚注意，遂使数千年来之中国经济思想，湮没无闻。”^②这颇能反映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

到了20世纪后半期，赵靖对经济思想做了新的界定。他认为：“经济思想，按照其本身的发展程度，可分为下列几种形式：①简单的或初级的经济思想：反映经济关系的某些原理、观念和范畴，以较低的抽象程度零散地存在着，或者只有某些表面的联系。②经济学说：在研究、说明某一方面的经济问题时，把若干有关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一定的分析、论证。这些联系、分析和论证，已大体上形成某种系统或体系。③政治经济学：不仅在许多经济问题方面已有了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已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其中，“经济学说和政治经济学都是经济思想的发展了的形式，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经济思想的最高发展形式”。据此，赵靖把经济思想史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经济思想史是包括简单的、初级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学说在内的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广义的经济思想史则是包括经济思想的一切表现形式在内的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也就是说，不仅包括简单的、初级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学说的发

① 王亚南：《经济学与哲学》，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页。

展史,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史在内。”^①在这里,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大了,不仅涵盖了经济学,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但是,赵靖区分广义和狭义经济思想的标准是政治经济学是否包括在内,于是产生了新的问题:经济思想的本质是由它的学科内容决定的,还是由学科之外的其他因素决定的(如政治的、阶级的,等等)?隐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还有这样一个追问:如果广义经济思想的概念可以囊括人类所有阶段的经济见解,那么它的学理依据是什么?

关于经济学的起源,阿马蒂亚·森曾指出:“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这二者都与政治学有联系,不过联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一方面经济学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又与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关系,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②这种溯源同前述刘絮敖等人的判断是一致的。需要探究的是,在古典经济学创立以后,这样一种哲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态势是否必然地被“替代”。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实际来看,“替代”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可以说,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③。

这一判断的潜台词不难揣摩,即就经济思想的实质性成长而言,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仍然是经济学的内在基础。巫宝三有言:“各个时代和各个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大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思想基础或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二是对于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主张和政策方案,三是对于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内在关系的分析。一个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常常包涵这三个方面的经济思想,最明显的例子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它既有

①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对象和方法》,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学集刊》编辑委员会:《经济学集刊》(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②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立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以道德哲学作为它的出发点的哲学思想,又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成因和各种关系的理论分析,还有由此得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各种经济政策处方。但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是如此明白地呈现出来这三方面的经济思想。作为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数理经济学家所作的经济分析,他们既不说明他们的经济分析所源出的基本思想,也不提出他们根据经济分析所作出的政策意见,而仅仅是对经济现象和问题本身内在和外在关系的分析和说明。”^①刘永瑞在2001年出版的一套西方经济学丛书的编者序中,赋予了经济思想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地位,他写道:“像其他学科一样,在经济学领域也有三个境界:一为满足于理解和传播既有的经济学知识,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不敢或不能越雷池一步,此为传道者或称其为经济学教授;二为针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困惑、新问题,敢于提出新观点,在解决新问题方面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径,此为解惑者或称其为经济学家;三为面对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和市场经济实践的重大变化,勇于和善于提出新理论,这种理论既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坚持,又是根本性的突破和发展,此为经济思想家或称其为经济哲学家。”^②“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家可谓多矣,但能受用经济思想家或经济哲学家称号者,并不多见……进入丛书的传主有五位: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从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看,这五位思想大师中的每一位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位,西方经济学说史都会出现令人扼腕的缺憾。”^③这就是说,只有融哲学与经济分析为一体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理论发展,这种思想的规范称谓就是“经济思想”。王元化提出过“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两个概念^④,拿它们来衡量经济科学,可以把古典经济学以前的经济观念称为“有学术的思想”,而现代经济学则以“有思想的学术”为最佳境界,它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

① 巫宝三:《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方面及其意义》,《经济问题与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857页。

② 刘永瑞:《序》,靳玉英:《自由主义的旗手弗·冯·哈耶克》,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④ 参见许纪霖:《知识学术分子死亡了吗?》,《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如果说哲学的存在规定了经济思想的学理内涵,那么在经济学日益成熟和细分化的今天,经济思想的外延应该由社会经济的发展系多层知识群体的综合力促成这一客观事实来加以解释。诺斯在分析历史发展中的交易成本时写道:“在一个政体框架内形成的产权结构将反映各方的相对谈判力量……最终出现的一般是‘无效率’的产权。这些无效率性的出现是因为,在一个最大化世界中,所形成的规则集一般必须考虑到交易成本和交易各方的竞争约束。”^①这里所说的交易各方既指一般意义的经济行为主体——企业家,也指其他社会经济的参与者——政府、民众(消费者)。也就是说,作为经济制度更重要来源的“非正式约束”是由远远超过专业经济学家的交易各方的“惯例”“习俗”“传统”和“文化”所构成的。关于这一点,20世纪中国的经验就足以证明。

关于政府领导人的作用,林毅夫等在《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载《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至于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则由政治领袖人物一手决定,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提出与经典作家不同的理论创新,这一点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他们进而断言:在这30年里,按照现代经济学规范进行的研究是不存在的。关于民众的作用,李占才在所著《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用一定篇幅分析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关资料,并且指出:“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济思想,还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经济思想,只有被民众真正领会、接受,才能发挥实际作用。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思潮,既反映了经济活动潮流,又表达了民众对付各种经济活动的因应心态……任何经济活动,最终总是民众的活动。民众的思潮,直接影响着民众参加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因此,研究经济思想史,不可不考察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思潮。”^②葛兆光说:“过去的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

① [美]道格拉斯·诺斯:《对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发展的交易成本分析》,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② 李占才:《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8页。

思想水准之上的‘精英思想史’”，“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或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了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①这个观点很值得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思考。

根据上面的分析，既有的经济思想观念尚存拓展的空间。照前述第一种说法，经济思想既然是指经济学尚未形成时期的零星经济观点，那么在系统的经济学创立以后，经济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就不存在了，或者即使存在，也已失去被关注和研究的价值。按照第二种界说，则在现当代，经济思想的存在形式已是经济学说、政治经济学，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理论日益发达的情况下，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实际上是合为一体了。然而这两种定义缺乏实例的支持，无论是社会经济史的史实，还是中外经济理论深化的趋势，都表明在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门类之后，具有更为丰富的理念价值和现实作用力的经济思想仍然存在。如果说在历史上，零星的经济观点曾经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得以形成的先行资料，那么在现当代，人们一方面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学理论对社会观念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强烈意识到经济学的未来不仅需要分析工具的精致，而且更有赖人类智慧和良心的导航。对此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当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说，通过对福利、贫困、灾害等问题的独特研究，“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公告特别提道：“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restored an ethical dimension)。”能开拓新领域供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不多，而重建经济学的伦理层面则是森不同于其他一些学术造诣也很深的经济学家的一个突出特点，以致另一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导论 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 页。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Solow)把森称作是“经济学的良心”^①。因此,经济思想的第一个涵义就是:它虽然也研究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内容和进展,但更加关注能够促进和规制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哲学思辨。

至于经济思想的第二个涵义,则是指它的包括范围。简而言之,①由政府决策者或社会政治家、哲学家等提出的经济主张;②由专业学者提出的经济学理论;③存在于社会公众之中的经济观念。这三部分资料构成了经济思想史所要加以考察的对象。

二

经济思想史的写法首先由它的研究对象决定。根据上一节对经济思想的定义,一部经济思想史,不管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理论史。在经济学理论形成以前,它可以只是零星经济观念的发展史;在民众的经济观念尚缺少足够的研究资料的情况下,这部分的论述也可以单薄些。就现当代而言,笔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和其他人士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经济发展观点等,都是经济思想史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且分析的重点不能偏重于技术性,而忽略其内在的思想价值。离开了其他人士的经济思想,没有对经济理论的思想挖掘,写出来的只能是经济学说史或经济理论史,不能算名副其实的经济思想史。

在已有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按人物分析是基本的写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最有价值和颇具难度的方法。按人物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可能被认为是中国史家的“列传”笔法,其实不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是对西方剩余价值理论史的回溯,其章节安排是以人物为主要线索。即使在最近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按人物分析也是经济思想史较多使用的方法,如泰萨·莫里斯—铃木撰写的《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厉以平译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晏智杰、刘宇飞、王长青、蒋怀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值得注意

^① 《译者序言》,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颉、于真译,刘民权、刘柳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的是,在一些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发展状况的著作中,按人物排列的写法也得到了采用,如J. R. 沙克尔顿和加雷思·洛克斯利写的《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潘慕平等译,胡代光等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这本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集中地介绍个人这种方式,可能会引起一些疑问。在一个日益强调制度、学派、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集合体的年代,这样分别地对个人进行考察,大概会被看作相当古怪甚至精神不健全。也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主人公中很少有几个是能够归并为一类的,除非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的类别,但这种分类法无助于说明问题,而只会掩盖问题。此外也许应当承认,我们在方法上有这样一种倾向性的看法:尽管经济科学数量化的性质日趋‘明显’,但经济学中大部分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仍然是需要通过解释和辩论来解决的,所以这里个人的作用仍然如以前那样重要。”^①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

中外学者普遍采用按人物分析的写法是有道理的^②。第一,这种写法在思想史资料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具有可操作性;第二,这种写法较能反映思想家本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第三,这种写法有利于清晰地勾勒出某一种理论的原创、发展的脉络,从而确定提出者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推进,人们发现越是到现当代思想资料越多,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也不仅限于思想家,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常常引起许多相关的学术争论或探讨,在这种情况下,按人物分析的方法变得困难了。以另一种眼光看来,也许显得陈旧了。但是,与后来陆续出现的其他写法相比,按人物分析的体系结构仍然有它的存在价值。这是由于:第一,思想是由单个的思想者提出的,思想史的过程由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和作用力的思想者的思想理论构成,没有了人,思想史就没有内在的激活动力和逻辑轨迹;第二,即使在思想活跃的学术繁荣时期,真正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也只是那些主导的、创新的、对社会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观点和理论,思想史没有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搜罗一个时期的全部经济思想资

① [英]J. R. 沙克尔顿和加雷思·洛克斯利:《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潘慕平等译,胡代光等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页。

②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都是以人物分析为基本框架的,如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等。

料(在这些资料中,大部分往往是平庸的、人云亦云的见解),也就是说,在研究有丰富资料的现当代经济思想时,其他的分析方法还不具备取代按人物分析的方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揭示某一种有价值的观点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里,一个重要观点由谁首次提出、在何时提出十分重要,照时下的说法,这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是与国际学术规范的接轨。要行使这一任务,按人物分析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第四,各种新的叙述方法对于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都是有益的探索,但这些方法如不以人物的个体分析为案头准备,有可能是割裂的、观点综述式的,这将成为学科研究水平提高的另一类制约。

陈岱孙说过这样的话:“浸润于经济学说史教学研究久了的工作者,在接触到某些新人、新说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新人、新说,在一本经济学说通史中,可能占的篇幅,作为评价其地位和重要性的标准;经常自问,这些新人、新说在若干年后编写的经济学说通史中,所占篇幅是一章、一节、一段、一句或只是一个提名,或者连名字都提不上?”^①他还说:“这个习惯,应用于对当代西方经济思潮中的人物、学派、学说的衡量,也较过去任何时期为繁难,但却似乎更有意义。”^②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如此,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此可见,关于经济思想史的写法,中外学者,国内从事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不乏共识。

在很大程度上,按人物分析的写法被其他方法所取代,并不是由于它的传统,而是由于它的困难,当需要进行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时,尤其是这样。它需要研究者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在时下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下并不“经济”。我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之所以富有魅力,主要不在于它的现实功用,让习惯于精神快餐的现代人按图索骥,为我所用,而在于它的深沉和底蕴,它在冥冥之中为人类发展规划路径。冰川的雄伟是由于它的七分之六在水下,与拍脑袋出灵感的新体系不同,厚实的历史学哪怕一时间没有炫目的华夏,也将以夯实的土基显示其价值。这就需要坐冷板凳,需要独

① 陈岱孙:《宋承先等〈当代西方经济思潮〉序》,陈岱孙:《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7页。

② 同上书,第608页。